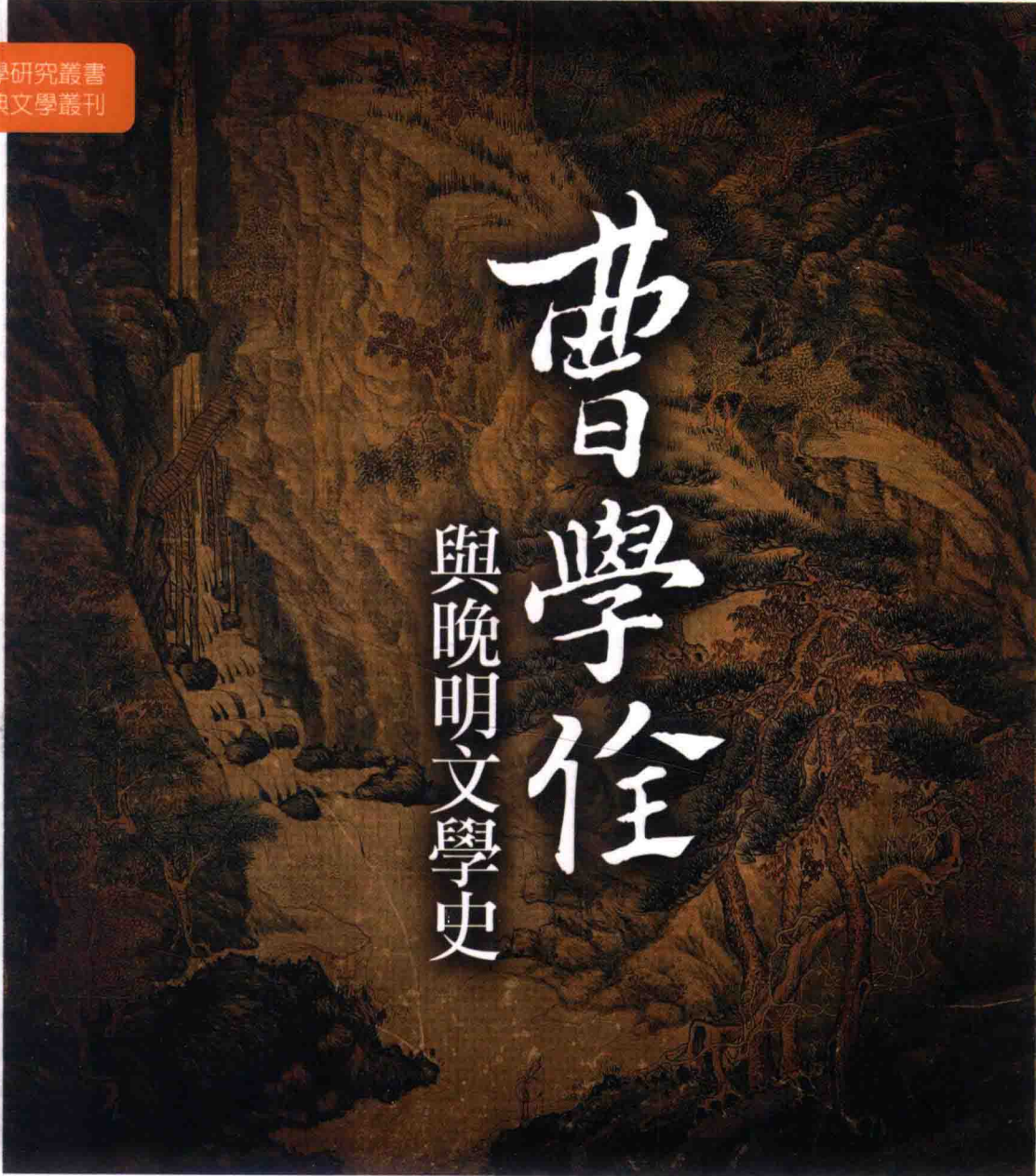


文學研究叢書
古典文學叢刊



曹學佺

與晚明文學史

本書以曹學佺研究為中心，透過作家詩文集、史地等文獻，勾勒晚明文人生活與文化活動，建構明代文學史研究的平臺，提供晚明一代文學研究更有力的文史材料，深化目前明代文學、社會與文化等論述。全書十二篇與明代文學史相關的論文，從文本、獻到文化，提供晚明文學史新的觀察面向。

許建崑 著

文學研究叢書・古典文學叢刊

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

許建崑 著

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

作者 許建崑

責任編輯 吳家嘉

特約校稿 林秋芬

發行人 陳滿銘

總經理 梁錦興

總編輯 陳滿銘

副總編輯 張晏瑞

編輯所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 斐類設計工作室

發行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 (02)23216565

傳真 (02)23218698

電郵 SERVICE@WANJUAN.COM.TW

大陸經銷 廈門外圖臺灣書店有限公司

電郵 JKB188@188.COM

ISBN 978-957-739-863-5

2014 年 2 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 600 元

如何購買本書：

1. 劃撥購書，請透過以下郵政劃撥帳號：

帳號：15624015

戶名：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 轉帳購書，請透過以下帳戶

合作金庫銀行 古亭分行

戶名：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877717092596

3. 網路購書，請透過萬卷樓網站

網址 WWW.WANJUAN.COM.TW

大量購書，請直接聯繫我們，將有專人為
您服務。客服：(02)23216565 分機 10

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4 by WanJuanLou Books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 / 許建崑著.

-- 初版.-- 臺北市：萬卷樓, 2014.02

面；公分.-- (文學研究叢書)

ISBN 978-957-739-863-5(平裝)

1.(明)曹學佺 2.中國文學史 3.文學評論 4.明代

820.906

103003898

目次

導論	1
晚明閩中詩學文獻的勘誤、搜佚與重建	25
——以曹學佺生平、著作考述為例	
萬曆年間曹學佺在金陵詩社的活動與意義	59
萬曆癸卯年福州詩壇盛事考	83
曹學佺《湘西紀行》的探究	107
曹學佺《石倉十二代詩選》再探	137
晚明福建詩人對竟陵詩派的接受與影響	257
洪芳洲先生詩文交誼考	279
焦竑文教事業考述	307
《明史·文苑傳》中歸有光、王世貞之爭重探	343
盧柟事件的真相、渲染與文化意涵	371
——〈盧太學詩酒傲王侯〉相關文本的探析	
唐詩格律的失落	389
——晚明詩風流變的歷史因素	
文學大眾化與大眾文學化	417
——重構明代文學史論述的主軸	
參考文獻	435
附錄：許建崑著作目錄	459

導論

本書共收十二篇與明代文學史相關的論文，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曹學佺與晚明閩中詩學研究」，包含六篇作品，是以曹學佺生平、著述為中心的考述，揭開我對閩中詩學史研究的序幕；跟隨著曹學佺進入南京的詩社活動，分享萬曆以後也是明代最後一場的詩壇盛景；萬曆卅一年返回福州參加凌霄臺大社等活動，創下閩中最大的詩社吟唱；而天啟三年從福州赴廣西桂林擔任右參議一職，走了五千多里路，留下可貴的文史資料；崇禎三年起的鄉居生活，曹學佺勤於著述、出版，尤其是編纂《石倉十二代詩選》，試圖建構詩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搜羅並編選明人詩集，輯為「當代詩史」，保存了明代文人詩文創作最豐盛的史料。最後，討論晚明福建詩人對竟陵詩派思想的接受與影響，為晚明詩派的繫聯與互動，提出事證。第二個部分是明代文人交誼與著作，有四篇，涉及洪朝選、焦竑、歸有光、王世貞、謝榛、盧柟等人的考述。第三個部分有兩篇，是我個人思索建構明代文學史書寫的概念。

一 構思明代文學史重寫的主軸

我對文學史的興趣，起於大學三年級。那時候幫楊承祖老師抄寫國科會論文《唐代詩人關係考》，體會了「詩人關係」的重要性；也自習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文學十家傳》等書，得到「文學與地域關聯」的概念。讀過朱東潤《張居正大傳》，愛上「評傳」的書寫方式。雖然碩士論文《王世貞評傳》寫得極不成熟，也知道「評

傳」並不適合論文寫作的方式，卻是我跨進明代文學史研究的第一步。

有關文學史書目的收集，最早見梁容若、郭宣俊在一九六二年《圖書館學報》四期發表；五年後梁容若又與黃得時在《文壇》八十七期聯合發表三校書目。一九七六年有署名青霜者在《書評書目》四十期起，分四期發表〈新編〉。在大陸方面，則見於一九八六年上海社會科學院陳玉堂的撰述，黃山書社出版，收錄文學史著作三三〇餘種；而一九九二年遼寧大學吉平平、黃曉靜合編《中國文學史著版本概覽》，著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間各類中國文學史著作五七〇餘種。國內則有黃文吉教授主編之書目提要收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四年之間（含部分一九九五年）臺灣出版的各類中國文學史專書一八五種，未正式出版的博、碩士論文七十八種，與附錄之簡明的版本資訊，共有一六〇六種。最近的是二〇〇四年鄭州大學陳飛主編《中國文學專史書目提要》，收集二〇〇〇年以前出版的專題史七一〇部，連同存目、外目、附目，合計二八八五部文學史的著作。

在這麼多文學史的著作中，還有甚麼空間可以闡述呢？有關文學史重新書寫的討論，近年來已有王鍾陵、龔鵬程、陳國球、王宏志、陳清僑、陳平原、柯慶明等人，從不同的角度，來建構新論¹。二〇〇二年三月，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與輔仁大學中文系合辦「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與學術研討會」。會議中，郭英德認為「文學史應是文學的歷史」，又說：「在文學史敘述中，既要揭示作家創

¹ 王鍾陵：《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市：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陳國球、王宏志、陳清僑合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臺北市：麥田出版公司，1997年3月）。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南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柯慶明：〈關於文學史的一些理論思維〉，「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頁183-208。

作的心態和人格風貌，更要高度重視和深刻闡釋作品中人的存在、活動、愛好、生存方式、精神體驗等豐富多彩的內涵」；但他也指出：「時間之流逝不可逆轉，文學事實一旦成為歷史，就脫卻了它的原初狀態。文學史記憶只能是人們篩選和重構的東西，它不可能完全重建在過去的時空存在的所有的文學事實。」他強調六項有機的聯繫，即作家與作家之間、作品與作品之間、文體與文體之間、作家創作與作品傳播之間、文學藝術價值與歷史發展上的價值之間、文學發展的結局與過程之間，都要有綿密的聯繫。我對他的論述極為贊同，知道「還原文學歷史現場」有困難，也不可能，但是我總得嘗試一下，來突破時空限制的樊籠。

陳燕則提出新文學史書寫的企盼，希望可以做到：史料的多面與活化、史識的獨立與多元、史論的直觀與審美。史料、史識與史論，一直是中文界較為忽略的議題，尤其是講求抒情傳統的當下。龔鵬程對文學史寫作充滿悲觀，他認為：史學研究中不予討論的文學史，新史學、新歷史主義也不研究文學史，而胡適、陳寅恪以來詩與史互證之傳統已斷絕，傳統的史實、史料、考據、訓詁、版本知識早已束諸高閣。目前的文學史討論文學「背景」粗略敷廓，抄抄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教科書之外，很少真正的鑽研²。作為講評人的柯慶明，建議他自己寫一本文學史來示範。

在這場會議之後，陳國球發表《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也改寫早期的論文書寫，名為《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在北京大學出版，從理論思考回到明代詩學的探索，作為實踐的例證。龔鵬程

² 郭英德：〈論文學史敘述的原則、對象和方法：以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撰寫為中心〉、陳燕：〈文學生命的自主、自立與自重：論文學史的涵義、效用與構成〉、龔鵬程：〈文學史的研究〉，俱見《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24、43-56、25-42。

則接納建議，寫了《中國文學史》上冊，由里仁書局出版，並接受《文訊》月刊社的安排，舉行一場新書發表暨座談會，邀請李瑞騰、張高評、顏崑陽、蔡英俊、廖棟樑、黃明理等人參與，會後張輝誠整理了座談會紀錄，吳燕真也發表一篇精闢的評論³。

顏崑陽在此前後提出了〈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他認為寫詩、讀詩是「中國古代知識份子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行為模式，而詩就是這種行為模式的中介符號」；從這個觀點來檢視明人詩文酬酢的意義，就不會鄙薄明詩人詩論偏頗與詩作不佳。顏崑陽又在陳世驥論述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與大陸學界馬克斯主義影響的學說下，試圖建構「完境文學史」觀。他說：「文學家乃處於『三重性』的歷史存在與社會存在之情境中生產其文本。」這三重限定下存在的關聯是「地域民族」、「社會階層」與「文學社群」；他討論「社會文化存在情境」，也指向「文學存在情境」。認為：這三重存在情境必然形成靜態結構性的疊合、混融與動態歷程性的交涉、衍變，而最終以符號形式的「文本」表現為可被理解、詮釋的「文學存在情境」。而從「社會文化存在情境」轉化為「文學存在情境」，並表現成符號形式的文本，其關鍵性因素即是「文學心靈」。最後他也認為「完境文學史」的寫作，有其困難。他說：「所有在某一歷史時期之詮釋學處境中所開展的視域，皆有所見亦皆有所不見，這是學術研究無法超越的『歷史性限制』，非關客觀性的謬誤。……假如能接近『完境』，必然是累積眾人之力，而成於一人之手的學術成果。」⁴「完境文學史」確實是文學史寫作崇高的理

³ 張輝誠撰：〈縱談古今、獨樹一格：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座談會紀實〉、陳國球：〈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讀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與龔鵬程〈我寫中國文學史〉三文均收入《文訊》，中國文學史專號，卷279（2009年1月）。

⁴ 以上論點見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

想，雖不能至，亦心嚮往之！

如果把文學史書寫，落實到明代的範疇。三〇年代出版錢基博《明代文學》、宋佩韋《明代文學史》，篇幅都不長，但都肯定文學思潮與活動，有自然變通的道理。一九九一年袁震宇、劉明今合著《明代文學批評史》，被編入「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五，觀念較為新穎，但偏向批評史的討論。一九九四年趙景雲、何賢鋒合著《中國明代文學史》，收入胡曉林、史仲文主編的《中國全史》中，並沒有突出的見解。一九九一年吳志達編寫《明清文學史（明代卷）》，二〇〇〇年段啟明《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元明清卷）》，二〇〇二年朱易安《中國詩學史（明代卷）》，都是在「中國文學史」大架構中的一環，作為教科書使用。二〇〇六年徐朔方、孫秋克合著《明代文學史》，由浙江大學出版，多了小說、戲曲的資料以外，徐朔方個人作家傳記考述的功底，並沒有在書中呈現。

要完成一本「明代文學史」，關注的面向太寬了。而近年來所見的專著，都是作者的博士論文或博士後研究的產品，侷限在更小的斷代、更小的議題上，也能讀到新銳的見解，如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明代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鄧新躍《明代前中期詩學辨體理論研究》、余來明《嘉靖前期詩壇研究》、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王英志《性靈派研究》、陳廣宏《竟陵派研究》等等。或者討論文學理論，如吳承學、李光摩《晚明文學思潮研究》、陳文新《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等等，都可以一新耳目。

然而明代詩學史的討論，還是集中在文壇舊聞雜錄，品評詩人性

論》，《淡江中文學報》18期（2008年6月），頁279-302；顏崑陽：〈從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流、佈體：「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清華中文學報》3期（2009年12月），頁113-154。

格特質，描繪文壇社交的相互攻訐，以及專注於詩論的緊張對立；對晚明詩學吟誦詠唱的文化活動，停留在概念化的敘述。

二〇〇四年參加南華大學明清文學與思想研討會，我開始思考「重構明代文學史論述的主軸」，撰寫以〈文學大眾化與大眾文學化〉為題的會議論文。這並不是個人的新見。日本學者前野直彬已經指出明代文學有三個特質：文學史的萌芽、古典的大眾化、體裁的跨越⁵；這三個論點都有助於「文學大眾化，大眾文學化」的論述。邵紅在《明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的緒論中，指出明代文學批評有四個特色：群體的關注、理論的對立、理論與創作的合一、論詩的偏重。⁶他認為明代的文人雅士無論地位高低、作品多寡、功名有無，俱從事於文學理論的探討，兩百餘年之間，可以說人人都是理論批評家，人人對於文學創作都抱持個人的看法。論詩者多，理論辯難者多，創作者多，參與的群體面極廣。我們怎可以說這些論詩、作詩的人都不是從事文學活動？

簡錦松談論〈明代詩文的庸俗化與反庸俗化〉，也指出明代詩文活動頻繁，帶來庸俗化的現象。⁷站在詩文品鑑的角度來看，大多數的作品多半是庸俗化。但是從人們參與踴躍的角度來看，則是作者眾多，作品量大，風格多樣化，品味歧出。這不也是「文學大眾化，大眾文學化」的特色嗎？

文學史研究不僅在於作家與作品的描述，或許更應該偏向文學的接受史，而以當代文人及庶民的文學活動為文學史論述主軸，觀察明

⁵ 前野直彬著，連秀華、何寄澎合譯：《中國文學史》（臺北市：長安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七章〈明〉，頁211-216。

⁶ 葉慶炳、邵紅合編：《明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臺北市：成文出版社，2001年），邵弘撰：〈緒論〉，頁1。

⁷ 簡錦松：〈明代詩文的庸俗化與反庸俗化〉，《中國文學講話（九）：明代文學》（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87年5月），頁13-23。

人集會結社、聯詩吟詠、曲詞唱和等活動為論述重點。由於參與者眾，書籍的出版與傳播受到強烈的鼓舞；各類文體也有多元發展的跡象。在「文學大眾化」的當下，發現參與各項文學活動的大眾，識字率提高，而詩詞文章寫作、解釋與評論權，漸由開國元勳、臺閣重臣、六部官員、地方縣官，下放到民間文人的手中。

明代文學思潮的演變，一直在「師古復雅」與「師心尚俗」二極之間如鐘擺效應一般反覆擺盪，卻永遠處在「二律背反」的狀態，無法追求統一。論述者如果想要「調合」這兩極的追尋，多半徒勞無功。如李維楨、袁宗道，都被當作次要的詩評家。大眾的寫作、閱讀或討論參與，會受到時空的政治、經濟、社會所左右，他們或許會盲從流行，追求高雅以化俗氣，或以流行為高尚，也很難說。但不論是復古、求新，雅正、通俗，都有「文學大眾化，大眾文學化」的傾向。從這個角度觀察，可以正確地省視文學多元發展的足跡，而不被過去感興式的文學史論述所迷惘。

文學開放給大眾分享，大眾也樂意投入這樣的文學消費；這就是「文學大眾化，大眾文學化」的意義了。

二〇一〇年應邀參加韓國中國學會主辦的第三十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提交〈唐音的失落：晚明詩風流變探析〉，順從陳國球「唐詩傳承⁸」的論述，來探討「唐詩為什麼不被傳承」的時空變異。個人以為明初詩壇，追模唐詩。唐詩形成的過程，音韻、格律、文體已臻成熟，歷經宋、元兩代將近四百年時間，以及民族遷移的因素，南來的河洛語言變化紛繁，難以揣摩原腔原調，只好尋求「文字化語言」形式的詩學。對於律詩、絕句等詩體韻律的掌握，只有從韻譜中去尋

⁸ 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此書修訂新版《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求，此所以詩學僅流行於中原移民為大宗的南方五省。到了明成祖以後，首都遷移北京，通行的官話系統，更加遠離唐、宋語音，對中原母語的認識更加困難。到了萬曆年間，又經歷了兩百年，古韻更形悠遠；加以社會文化風氣大開，大眾投入詩作酬唱者眾，而韻譜、聲律之學艱澀難懂，浸淫時短，轉而厭棄格調，開始追求性情上的自由。既然聲韻、格調皆喪，襲套又去，詩學失落可知矣。雖然格套脫去，詩人對內在心靈世界的探索，脫開疆繩，未始不是得到另創新局的機會？

談論晚明詩學，每每被文人個別使用的詩論術語所左右，不易悟得真義；又被文壇雜說、文人逸事、相互攻訐的陳年舊聞所誤導。如果我們只把目光集中在唐詩格律的繼承與失去，借用本體論、文體論、創作論等等分析理論的幫助，即可以分辨文學核心思想、活動史、文體演變、作家心靈、文學理論等項目，不會含混而不名所以。借用現代社會文化論述，也可以檢視晚明詩學的理論從統合到分立，又從對峙到並陳，開展出多元的主張；而庶民熱情的投入文學運動，渴求典雅化，詩風卻傾向庸俗與抄襲，顯現「文學大眾化」的無奈。我個人接納「文學大眾化，大眾文學化」的事實，不去臧否作家與作品，而是從文本與文獻中爬梳，提供文人生活史、交誼史，以及文學吟唱酬酢等活動，來完成探討「明代文學史」的基礎工作。

二 重返史料整理的基礎工作

事實上我在研究所畢業，服完兵役以後，有幸回東海任職，擔任現代小說、戲劇、兒童文學、古典小說等課程，並未放棄明代文學史的鑽研。嘗試從王世貞的研究擴及後七子，陸續發表了〈後七子交誼考〉、〈宗臣評傳〉、〈李攀龍與鍾惺選唐詩格的異同〉等文，但都不

太成熟。原因是閱讀原始文本困難重重，解讀與判斷的能力也未到位。每每查閱國家圖書館所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只要是功名不顯的詩人作家，往往遺漏，因此在邊查邊補正的狀況下，連續三年增補了後七子、前七子文集中相關的人物生平資料，並在學報發表。

也因為這幾篇小作，得到正在編纂《明人傳記資料索引新編》的王德毅老師器重，分得了一些編寫工作。那時清華大學邀請洪銘水、錢新祖教授分別返國主持「明代文學與社會研討會」，每月邀聚一次，讓我漸漸熟稔明代研究的領域，認識了許多相同領域的研究者。而吳智和正以個人的力量編輯出版《明史研究專刊》，適時提供了我關注歷史文獻與文化論述的窗口。因為有這些機緣，我撰寫副教授升等論文《李攀龍文學研究》，就有了較為廣闊的視野。

在新遷南海路的國家圖書館之中，調借《滄溟集》，發現同署「隆慶刊本」的六條著錄中，竟有徐履道起鳳館、胡來貢、吳用光補刊本、楊日賓校刊、張弘道校刊，有別於王世貞較早的刊本；再加上早期還有魏裳、汪時元不同時期的《白雪樓詩集》，清代的四庫抄本、景福堂刊本，以及舊抄本等等，就有十二種之多，如果能思考這些版本傳承的關係，顯然可以勾勒出「李攀龍詩文集」在明清迄今的出版、流傳，以及被讀者接受的情形，也可以突破枯燥無趣的版本交代。

工具書的使用，較以前方便。以前只有哈佛燕京社出版《八十九種明代傳記資料索引》、國家圖書館主編的《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忽然增加了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王德毅《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杜信孚《明版刻綜錄》，甚至連《明代刊工姓名索引》都有了。史地類的《明實錄》、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焦竑《國朝獻徵錄》、雷禮《列卿記》、楊正泰《明代驛站考》，提供閱讀查核的方便。臺大周駿富編有「明代傳記叢編」，明文出版社出版，更將百餘種史料叢書，彙整成套並附有索引，檢索

極為方便。而古人詩文集的影印再版，改變了閱讀模式。四庫、存目、禁燬叢書、續修四庫，以及電子版的中國基本古籍庫「愛如生」相繼問世，開放使用，改善了以前必須蹲伏各大圖書館古籍庫的痛苦。我想，如果能夠提供研究者便捷有效的《明代文史工作手冊》，相信可以召喚更多年輕朋友來耕耘這塊領域。

三 交誼與年譜編寫體例的思考

一般的年譜書寫，有些沒有訂出體例，而有些注意到了，卻不嚴守章法，被一大堆歷史事件或當代名人事蹟佔據篇幅。在時間上的紀錄，或稱朝代，或稱干支，或雜紀西元，隨意使用；在行文中，傳主的交往友人，或稱姓名，或稱字，或稱號，或僅以官職代稱，未能統合人物的真實身分；在地理、官職、月令上，或以古名代稱，有些故弄玄虛，如地名不稱北京、福州、長泰、邵武，而以長安、三山、吳航、樵川代之；官職不稱吏部尚書、刑部尚書、布政使，而以大冢宰、司寇、方伯代之；記載時日，則署以穀日、人日、元夕、花朝、清明等節令，皆因擬古、復古之風所成，在在增加了詩文閱讀的困擾。而且大部分的年譜在龐雜的抄述中，並沒有留下資料線索。作品完成後，無法回頭去核對史料的正確性。我以為只有用綱目體來寫作，是個比較合適的方法。

在傳主每一年的紀事中，應該羅列朝代紀年、干支與西曆，並寫出傳主年紀。以個人扼要的敘述為綱，而引述的資料為目，來交代綱要上述說的憑據。大事紀或朝廷實錄，或邸報，與傳主有關的史事，應列入正譜，與傳主並無直接關係的史事、友人事蹟，則放入備考欄。有神蹟式的描述，譬如誕生神話、白日飛昇、割股療親等情節，應謹慎處理。對於傳主與家人、親戚、同僚、友人，則不忘記其年

歲、輩分，以便刻畫互動的情境。家系的書寫，係以直系為主軸，伯叔、從兄弟等敘述，都要考慮到親疏遠近的關係，而有所節制。交代親戚關係，宜另立一節，或者放入交誼中處理。所謂鄉、戚、學、誼，在傳主的生活史或創作史中，會有較親密的關聯，可以留意主客雙方文本中的碑、狀、墓、銘、誄文、書序、送行序，也可以在地方志的學校、選舉（榜單）中尋獲蛛絲馬跡。方志之中還有職官、名人傳、宦蹟傳、文苑傳、隱逸傳、藝文志等等，都可以交互補充人物的姓名、字號、里籍，以及到任或離職的時間。也要注意史書的本紀、列傳、表、志，可以按圖索驥。

最重要的書寫要訣是「統一視角觀點」，要以傳主為「限制的第三人稱觀點」，來加以敘述；不可雜抄文獻材料中不同角度的敘述語氣。至於文學交誼的書寫，要避免直接抄錄傳記資料索引、維基、谷歌、百度等文字；要處理交誼時間的斷代，要標注兩人交誼的狀態與詩文酬酢。

一九八七年我個人寫了《李攀龍文學研究》，對於年譜、家傳、交誼、著述與流傳等書寫體例，思考過革新的可能。稍後撰寫〈焦竑文教事業考述〉、〈洪（朝選）芳洲先生詩文交誼考〉時，對文獻資料的勾稽與解讀能力，也比較進步。

〈焦竑文教事業考述〉是試圖離開「後七子」的範疇，移向萬曆以後的文化觀察。焦竑（1540-1620）的祖先山東日照人，因為南京旗手衛的軍籍而寓居。廿五歲中舉，廿七歲擔任耿定向創立南京清涼山崇正書院山長。萬曆十七年（1589）以五十歲高齡進士登科第一。他繼承泰州學派對王陽明學說的闡釋，又受到李贄的啟發，走到「三教匯通」的路上。以佛學的觀點來注解老、莊。在他一生八十一年歲月中，包含任官九年，都以著述、講學為重心。四庫館臣說他思想駁雜紛亂，係以傳統「獨尊儒術」的態度來評論。但是在萬曆晚年多

元思想的勃發中，企圖走出「封建帝制、儒學箝制」的僵化局面，焦竑寬容包涵的精神是可敬的。他甚至啟發了弟子徐光啟，接納西洋思想的新格局。焦竑廣博閱讀、勤作筆記，編輯了許多書籍，推廣地方教育，嘉惠學子。

有關焦竑生平及思想之研究，已有容肇祖於一九三八年撰著專文，另有李焯然撰述多篇相關焦竑之研究；然而對於焦竑之著述與編纂書籍，驛入了部分他人偽託之作，則未能辨析。拜電腦科技發展之賜，搜尋工具更新了，容易找到許多冷僻的資料。在此文中，敘述焦竑生平、思想及其教育理念，重點在於考訂其著述與編纂之實情，以增補容、李二先生所未備。試圖就焦竑參與的各項文化、教育活動，打開一個新的探索方向。

接近明代福建作家研究，肇始於一九九八年〈洪朝選詩文交誼考〉的這篇文章。此文為吳智和代洪朝選第廿一世孫福增邀稿，收入《洪芳洲論集》中，並在《東海中文學報》修訂發表；廈門大學方友義主編《洪朝選研究》時，原文又轉載了一次。邱燮友教授等譯釋《洪芳洲先生詩文集》時，書中提及的人物小傳，也採用該文資料。

除了這兩篇作品之外，二〇〇六年〈孫克寬先生行誼考述〉、二〇〇九年〈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的撰述，也用了生平傳記考查、人物繫連與文本細讀的方法。

孫克寬（1905-1993）老師是孫立人將軍的五侄，來臺以後暫居屏東、臺北，最後在臺中東海教學十七年，以古典詩學名家，擅同光體，兼研究宋、元學術，曾經啟發了史學界的黃寬重。夫人過世後，依親加拿大，隨同遷往美國，專注道家學術研究，著有《寒原道論》。因為政治的關係，孫老師行事低調，鮮少談論個人私事。此文寫於「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傳承」學術研討會，考述孫老師生平往事，間及六、七〇年代臺灣學術界與文化界的互動。

撰寫趙鍾麒《三六九小報·史遺》專欄寫作之研究，附帶理解了清朝臺灣人赴福州省城考舉人的過程，也觀察古典詩社吟誦的風氣在臺南古城復現。趙鍾麒（1860-1936）廿一歲入學，廿八歲補府學生，四次赴福州秋試。乙未（1895）割臺後，斷了科舉道路，擔任臺南地方法院日華通譯二十多年；並與許南英、連雅堂等人共結詩社，榮膺南社第二任社長二十餘年。對於臺灣詩學的推廣，貢獻很大。後來我把這個題目交給研究生劉慧婷，完成《趙鍾麒及其詩學研究》的碩士論文。

四 明代文化與社會的觀察與描述

透過文獻資料來重探文學史，或許有較貼近真實的面向。一般的論述，以王世貞為模擬復古派「後七子」的代表；歸有光則為「唐宋派」的代表；兩人文學主張不同，勢同水火。《明史·文苑傳》稱：「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舐排，目為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為之贊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這件事，近人錢鍾書已加以辨正，他說：錢謙益在《初學集》、《有學集》、《列朝詩集》中，為了強調「王世貞晚年定論」，把王世貞論贊中「久而始傷」之語，改為「久而自傷」，而且反覆引用在五篇文章之中。一字之易，意義全改，也使《明史·文苑傳》的編寫者，以及後代部分的學者沿襲而誤用。

此文透過文獻重構，在方志、譜系、文集等資料的爬梳，希望能夠呈現歸有光、王世貞兩人的生平、譜系、性格與行事作風，也試圖從中了解歸、王兩人在文壇、鄉里與遠親上的關係，來證明文學史中的論述，涉嫌誇大兩人的摩擦，為了貶抑王世貞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加倍讚揚歸有光的文學成就。